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

許雅惠*

【摘要】北宋的士大夫文人「再發現」商周古代銅器與其文化價值之後，在有利的政治、社會條件之下，透過文物本身以及金石圖錄、禮圖與其他圖籍的媒介，在中國南北各地出現各種仿商周古銅器的器物，古銅風格的流行也影響到周邊的日本與韓國。本文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相當於高麗中期至朝鮮前期）的韓國為中心，結合文獻、圖籍與器物，考察所謂三代古銅器意象流布海東的背景脈絡，并追蹤朝鮮王朝禮儀基礎的《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之中國源頭及朝鮮之新詮釋。《世宗實錄》像個時間膠囊一般，擷取並綜合原來在漢地前後相承、彼此競爭的不同禮器系統，有些在中國已不存在的禮器造型也透過朝鮮的新解釋而被保留下來，甚至流傳到今日。這也讓我們再思考「禮失求諸野」的古老說法—雖然在所謂文化邊緣地可看到與文化中心地類似之禮與禮器，但內涵已經過多重轉化。

關鍵詞：仿古高麗青瓷、朱熹釋奠儀圖、金石學、東亞文化互動

東亞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儒家的倫理價值系統，與這不無關係的是三代古銅器形象在中日韓的普遍流通：在中國，古銅器形象從宋代金石學開展以後便大行其道，從地上世界的文玩、傢具、收藏品到地下世界的墓室浮雕，均可見其蹤影；在日本，除了東京湯島聖堂祭器之外，也見於室町以來的茶道花器；在韓國，從高麗時期的青瓷到十八世紀的博古屏風同樣可見商周古銅因素。實際上，將這些時間跨距極長、牽涉地域範圍廣大的器物相提並論不一定恰當，因為除了在中國我們可以觀察到長期、連續性的發展之外，日、韓二地的演變尚不清楚。但羅列此類器物卻也可見此一文化語彙帶有某種跨越東亞時間與空間之廣泛性。①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助理教授

① 關於書畫藝術當中跨越中、日、韓的東亞文化意象，參石守謙、廖肇亨主編，《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臺北：允晨文化，20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要討論這複雜的文化現象必須追溯到宋代的中國，當士大夫文人「再發現」商周古代銅器與其文化價值之後，在有利的政治、社會條件，透過文物本身以及金石圖錄、禮圖與其他圖籍的流布，古銅器對於宋代以下物質文化有著廣泛影響。② 除了禮制用途的禮、樂、祭器之外，一般日用器物也經常仿自商周銅器，例如：古代的盛食器鼎、簋、鬲成為香爐，而酒器觚與尊成為花瓶。商周銅器的銘文、器形、裝飾紋樣大量出現在所謂的裝飾藝術當中，裝點著風雅、或是附庸風雅的生活。此文化風氣也傳遞到周邊的日本與韓國，以下簡述相關研究成果。

音樂史學者早已關注中國與韓國音樂的關係，③ 特別是帶有復古意圖的宋徽宗大晟樂對高麗、朝鮮的宮廷雅樂之深遠影響；④ 陶瓷史學者則注意到李朝宮廷的銅質、陶瓷祭器，這些祭器按照朝鮮禮書中的規範所製作，而朝鮮禮書

---

② 近來有不少關於宋代考古、金石的相關研究，參見陳芳妹，〈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0期（2001），頁37-160；Yun-Chiahn C. Sena, "Pursuing Antiquity: Chinese Antiquarianism from the T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7); Ya-hwei Hsu, "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in the Era of Print, 960-1279"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10); Jeffery C. Moser, "Recasting Antiquity: Ancient Bronzes and Ritual Hermeneutics in the Song Dynasty,"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10).

③ 韓國傳統音樂研究在二十世紀下半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其中「宗廟祭禮樂（*Chungmyo cheryeak*）」在1964年被南韓官方指定為重要無形文化財，又在2001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指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關於韓國音樂史的通論著作，參Park Chong-hua, eds., *Survey of Korean Arts: Traditional Music* (Seoul: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1973), pp. 7-22; Song Bang-song, *Korean Music: Historical and Other Aspects* (Seoul: Jimoondang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p. 3-38.

④ 關於宋徽宗賜與高麗樂器的討論，見Keith L. Pratt, "Music as a Factor in Sung-Koryŏ Diplomatic Relations 1069-1126,"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62.4/5 (1976), pp. 199-218; Keith L. Pratt, "Sung Hui Tsung's Musical Diplomacy and the Korean Respon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44, no. 3 (1981), pp. 509-521。關於宋樂—特別是宋徽宗大晟樂—對朝鮮世宗朝制禮作樂的影響，見Robert C. Provine, *Essays on Sino-Korean Musicology: Early Sources for Korean Ritual Music* (Seoul: IL JI SA, 1988)。Provine 仔細討論李朝世宗對唐、宋、元時期音樂相關圖籍文獻的參考與取捨，特別是選擇宋樂作為仿效的對象，世宗與他的大臣也因此認為朝鮮所「恢復」的宋樂較同時期明朝宮廷音樂更為雅正。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則來自朱熹釋奠儀。⑤ 除了宮廷禮儀用物之外，日、韓上層階級對於宋代以下仿古銅器之受容情況，近來也逐漸受到學界重視。從新安海底沈船出水文物包含仿古銅類型銅、瓷器可知，至少在十四世紀，日、韓已發展出對中國古銅風格器物的興趣與需求。日本學者久保智康收集整理日本出土的十三至十六世紀的仿古銅器，討論這些器物在日本的使用情況，包括寺廟佛供與武家裝飾之用。⑥ 後來在室町、桃山、江戶初期的茶道會當中，來自中國的「唐物銅器」（即南宋到明初之仿古銅器）與日本當地仿製的「擬唐物銅器」成為重要花器。⑦ 久保也就琉球十七世紀之仿古銅器作一初步考察，它們的類型以供器組「三具足」（香爐、花瓶、燭台各一）為主，有別於日本茶道珍賞之「唐物銅器」。⑧ 久保智康這一系列研究，大致勾勒仿古銅器在日本的使用與發展，但作者並未涉及其他材質，不知除了金屬器之外，來自中國的「唐物銅器」是否也與日本其他工藝傳統有所交流。另外，在日本的脈絡中，此類深具中國上古色彩的銅器有何文化價值與意義，也待進一步討論。

至於仿古銅類型器物在韓國的情況，除了前述樂器與李朝祭器外，尚未見系統性的整理與討論。本文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相當於高麗中期至朝鮮前期）的韓國為中心，結合文獻、圖籍與器物，考察中國三代古銅器意象流布海東的背景脈絡，並追蹤朝鮮祭器圖式之中國源頭及在韓國陶瓷所見之新詮釋。之所

⑤ 伊藤郁太郎，〈朝鮮時代の官窯の成立と展開〉，《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東洋陶磁學會，2002），頁263-269；최순권（崔順權），〈종묘제기고（宗廟祭器考）〉，收入궁중유물전시관（宮中遺物展示館），《종묘대제문물（宗廟大祭文物）》（서울：궁중유물전시관，2004），頁156-178。本文有中、日文摘要。

⑥ 久保智康著，彭濤譯，〈新安沈船裝載的金屬工藝品：其特點以及新安沈船返航的性質〉，《南方文物》，2008年4期，頁142-154、141；久保智康，〈中世日本における倣古銅器の受用と模倣〉，《東アジアをめぐる金属工芸—中世・国際交流の新視点》，アジア遊学134（東京：勉誠出版，2010），頁173-191。

⑦ 久保智康，〈茶の湯における唐物銅器〉，《野村美術館研究紀要》，第20期（2011），頁1-66。本文整理茶會記中對於銅花器的紀錄與流傳至今的「唐物銅器」，討論室町、桃山至江戶初期茶道中「唐物銅器」的使用情況、風格表現特徵、與茶人的關係。

⑧ 久保智康，〈「東アジアをめぐる金属工芸」その成果と課題—中国、朝鮮、日本、そして琉球〉，《東アジアをめぐる金属工芸—中世・国際交流の新視点》，頁272-2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以十二世紀為討論起點，是因為此時宋、麗官方外交轉趨密切，徽宗甚至將復古禮樂器賜給高麗，在南宋開始流行的仿商周銅器作風也被引入高麗青瓷；而以十五世紀為討論下限，則因此時開啟另一階段的互動交流，大量漢地規制透過典籍傳入朝鮮，在朝鮮一朝宮廷典禮的形成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成為此後朝鮮禮儀制度的基礎。

一、商周銅器的再興與流被海東

商周以禮器為主的青銅文化濫觴於二里頭，發展於商、周，而大約在秦滅六國劃下句點。有別於青銅時代的其他文化，商周青銅文化的特點是有著大量且種類複雜的儀式性容器以供祭祀與宴饗，包括食器盛裝黍稷肉類，酒器盛裝醴酒，水器以供沃盥。容器的種類分化代表著盛裝內容的區別與相關禮儀的細緻化。在世界各古文明當中，複雜多樣的容器標誌著黃河流域古文明的特點。

秦漢奠定帝制中國的基礎，作為維繫商周貴族身分等級的青銅器失去了賴以維持的社會結構，成為昨日黃花。即使不再具有實際的社會功能，但是商周青銅禮器並沒有被遺忘，而是被神話化，從「九鼎」傳說到武梁祠室頂畫像中「不炊自熟，五味自生」的神鼎，都與三皇五帝一般成為歷史記憶的一部份。於是從漢到唐，因「地不愛寶」而出現的鐘鼎彝器成為祥瑞的象徵、天命之符瑞；⑨ 古代器物以其神異性格被收集、記錄下來。這種神祕性的解釋到北宋中期出現轉折，劉敞、歐陽修等人首度將青銅器當作過去的文化遺存來收藏，將其視為客觀存在的物件來研究，從銘文出發，也逐步對銅器的造型與名稱、紋飾的作用等，發展出一套方法，開啟了「金石學」此一研究領域。他們相信，

⑨「地不愛寶」是宋代常見的詞語，其本身就帶有神異色彩，就如天降祥瑞一般，地也以出寶物的方式傳達天命。關於歷代銅器之出土與神話性的紀錄，見Noel Barnard, "Records of Discoveries of Bronze Vessels in Literary Sources and Some Pertinent Remarks on Aspect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6, no. 3 (December 1973), pp. 455-546. 關於中古時期銅器的神異解讀及其與道教的關係，見François Louis, "Cauldrons and Mirrors of Yore: Tang Perceptions of Archaic Bronzes," *Georges-Bloch-Jahrbuch der Universität Zürich*, no. 13 (2008), pp. 203-2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透過對一手材料的研究，可以讓他們對三代文化有更直接而深刻的認識，訂正傳世文獻的謬誤。

在歐陽修（1007－1072）與劉敞（1019－1068）的提倡下，後起的士大夫、文人無不投入商周古銅器的收藏，無論是以文學知名的蘇軾（1037－1101）、以科學知識見長的沈括（1031－1095）、或是以繪畫揚名的李公麟（c. 1042－1106），他們均收藏古銅器，也屢發議論。各收藏家也經常將所藏古銅器整理出版，如歐陽修的《集古錄》收錄了他所收藏的古器銘文，原有一千卷，包含十數件銅器銘文。到了十一世紀晚期，出現《考古圖》（後序於1092）一書，作者為宋哲宗元祐年間任宰相的呂大防（1027－1097）之弟呂大臨（1044－1093）。書中收錄二百多件銅器與十餘件玉器，除了少數來自內府收藏，多半集錄自三十多位私家收藏，當時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文彥博（1006－1097）之藏品也在其中。這本書與歐陽修的《集古錄》不同，除了銘文之外，它還紀錄了器物的圖像、出土地、收藏地、尺寸等，具備了現代圖錄的基本要素。

以呂大臨為主的元祐學者合作《考古圖》一書很難不令人聯想到北宋黨爭，新舊兩派人士以象徵三代理想的古銅器作為各自政治立論之依託。⑩ 北宋研究古銅器的經世取向以宋徽宗（r. 1101－1125）之《宣和博古圖》為代表，在宋徽宗的大力支持下，原來以士大夫為主的古銅器收藏研究一變而為皇家事業，前代士大夫的收藏大量地進入宮廷，並且成為徽宗禮制改革當中新制禮器的範本，宋代中葉開始發展的金石學至此達到高峰。就金石收藏研究對於禮器的影響而言，徽宗以銅鑄成之「新成禮器」（圖1）在某個程度上取代了宋初以來根據聶崇義《三禮圖》所製造的竹木祭器，將商周銅器要素注入了朝廷禮器，但由於《三禮圖》之使用由來已久，也許可上溯到東漢，漢至唐代也偶而可見《三禮圖》類型禮、祭器。⑪ 因此要根本斷絕《三禮圖》的傳統也不可

⑩ 關於北宋古銅器圖錄編纂的政治性及其與新舊黨爭的關係，見Ya-hwei Hsu, “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in the Era of Print, 960-1279,” pp. 36-61.

⑪ 如唐代哀皇后陵出土之山尊、犧尊，見謝明良，〈記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172-189。其他漢至唐《三禮圖》類型器物的討論，見Ya-hwei Hsu, “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in the Era of Print, 960-1279,” pp. 25-36.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能，而形成《宣和博古圖》與《三禮圖》兩種類型禮祭器并見的情況。

金石研究雖與禮有關，但作為金石圖錄的《宣和博古圖》本身對禮祭器設計製作的直接影響有限，因為一般禮的執事者很難直接運用這套包含三十卷、八百多件銅器的龐大圖錄，它對禮的影響主要透過禮圖的轉介，最主要的兩本是南宋時期編成的《紹興製造禮器圖》、《紹熙州縣釋奠儀圖》（以下簡稱《釋奠儀圖》）。前者是在宋室南渡、於紹興十二年宋金和議後所編纂，為了恢復徽宗「新成禮器」，高宗朝廷不僅大量重製新成禮器，也從《宣和博古圖》中選出了十數件器物編纂為《紹興製造禮器圖》，并將其鏤版、頒發至州縣。此舉將徽宗的新成禮器制度推廣到地方，不過效果也許不如預期，所以當朱熹（1130－1200）於淳熙六年（1179）知南康軍時，抱怨地方州縣春秋釋奠文宣王不合禮儀，祭器仍因循《三禮圖》之舊，因此上書請求禮部將合適的儀節與新成禮器頒發至地方。朱熹的請求一直到紹熙五年（1194）才得到回應，禮部太常寺將高宗年間頒布的《紹興製造禮器圖》與《政和五禮新儀》中合於州縣的儀節下臨安府鏤版，裝背作冊，頒發地方，成為《紹熙州縣釋奠儀圖》，⑫由此可知《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的圖像實來源自《紹興製造禮器圖》。後者現今只存文字，收錄在《中興禮書》當中；⑬不過《釋奠儀圖》尚有傳世，可供我們推想《紹興製造禮器圖》的圖像大概。換句話說，《宣和博古圖》對禮器製作的影響是間接的，是透過二手禮圖：從《宣和博古圖》而有《紹興製造禮器圖》，從《紹興製造禮器圖》而有《釋奠儀圖》，三者間彼此相互繼承。⑭在朱熹門人弟子的推廣下，《釋奠儀圖》一書成為南宋晚期到元代地方文廟祭器製作的主要參考，至今尚有不少實物留存。⑮

以上將古銅器在北宋中葉以後的再發現與新角色稍作交代，由於文中會一直提到《宣和博古圖》與《釋奠儀圖》二書，所以必須在一開始就將這些書籍

⑫ 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⑬ 徐松輯，《中興禮書》，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822，頁40-44。

⑭ 關於《宣和博古圖》、《紹興製造禮器圖》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的關係，見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4期（2003），頁1-26。

⑮ 見陳芳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1期（2011），頁61-1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關係說明清楚。在北宋中期之後復興的古銅器與相關禮器系統是如何傳到高麗呢？

北宋初期，高麗與宋間曾有密切的官方外交，在建隆三年（962）高麗就遣使朝貢，開始了宋、麗的官方外交。⑯ 宋代宮廷的禮儀規制，包括「祭器圖」，⑰ 以及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大規模開雕的《大藏經》⑱ 均被帶到高麗。但隨著北宋早期幾次伐遼戰爭的失利，衡量政治現實，高麗於成宗十三年（宋太宗淳化五年[994]）開始奉遼正朔，使節往來則時通時輟；在宋仁宗即位後，宋、麗外交幾乎停頓，終在天聖八年（1029）高麗遣使來華後劃下句點，「其後絕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⑲ 即使在官方關係陷入低潮的情況下，兩國間仍有著文化層面的交流，主要透過個人、商旅，如《高麗史》記載，在1027年時，有江南人李文通向高麗顯宗獻書冊五百九十七卷。⑳

1068年在宋朝主動派遣地方官員至高麗示意之下，㉑ 兩國重啟外交，1071年高麗使節再度來到汴京，㉒ 1078年宋神宗也派遣使節出使高麗，并賜高麗樂

⑯ 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487，頁14036。關於宋麗外交簡史，參陳尚勝，《中韓交流三千年》（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23-29。

⑰ 成宗二年（983，宋太平興國八年）：「五月甲子九日……博士任老成至自宋，獻大廟堂圖一鋪并記一卷、社稷堂圖一鋪并記一卷、文宣王廟圖一鋪、祭器圖一卷、七十二賢贊記一卷」，見鄭麟趾，《高麗史》（漢城：延世大學校出版部，1961），卷3，頁67-68。

⑱ 成宗十年（991，宋太宗淳化二年）：「韓彥恭還自宋，獻大藏經。王迎入內殿，邀僧開讀，下教赦。」見鄭麟趾，《高麗史》，卷3，頁77。

⑲ 脫脫，《宋史》，卷487，頁14045。

⑳ 顯宗十八年（1027，宋仁宗天聖五年）：「宋江南人李文通等來獻書冊，凡五百九十七卷。」見金渭顯編，《高麗史中中韓關係史料彙編》（臺北：食貨出版社，1983），頁33。鄭麟趾，《高麗史》，卷5，頁110。

㉑ 文宗二十二年（1068，宋神宗熙寧元年）：「秋七月辛巳，宋人黃慎來見，言皇帝召江淮、兩浙、荊湖南北路都大制置發運史羅拯曰：『高麗，古稱君子之國，自祖宗之世輸款甚勤，暨後阻絕久矣。今聞其國主賢王也，可遣人諭之。』於是拯奏遣慎等來傳天子之意。王悅，館待優厚。」見鄭麟趾，《高麗史》，卷8，頁177。

㉒ 文宗二十五年（1071，宋神宗熙寧四年）：「三月庚寅，遣民官侍郎金悌奉表禮物如宋。初黃慎之還，移牒福建，請備禮朝貢。至是遣悌由登州入貢。」見鄭麟趾，《高麗史》，卷8，頁179。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器。㉓ 因應女真的興起，宋朝積極拉攏高麗，兩國的關係在十二世紀宋徽宗在位時達到高點。在兩國官方來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晟樂的傳入高麗。1113年（高麗睿宗八年，北宋徽宗政和三年）安稷崇使宋，十月出發、十一月抵達汴京，隔年六月還自宋。㉔ 此時正是徽宗朝廷禮樂改革進行地如火如荼的時候，附錄表格整理這兩年間徽宗的禮制改革措施。

根據附錄可知，此時新的禮儀規章《政和五禮新儀》已在政和三年四月頒布，大晟新樂與編鐘也在政和三年五月頒布天下，禮器則從當年七月開始密集改製，為此，各地也不時進獻地下出土的古銅器，一方面作為肯定徽宗作為的天降祥瑞，一方面也作為新制禮器的參考。政和四年五月鑄成了第一批郊祀禮器，此時安稷崇尚在汴京，不知是否得見。六月，安稷崇帶著徽宗賜與高麗睿宗的樂器、曲譜、指訣圖啟程回國，檢視此次賞賜清單，并沒有編鐘，㉕ 編鐘的賞賜要等到下一年。

1115年高麗睿宗派遣王字之、文公美如宋，并派高麗進士五人至太學就學，㉖ 翌年王字之返國時，宋徽宗鄭重地將大晟新樂與樂器賜給高麗，并詔曰：「三代以還，禮廢樂毀，朕若稽古，述而明之，百年而興，乃作大晟……夫移風易俗，莫若於此，往祇厥命，御于邦國，雖疆殊壤絕，同底大和，不其美歟，今賜大晟雅樂」。㉗ 樂器作為外交手段在這段文字當中表達得淋漓盡

㉓ 鄭麟趾，《高麗史》，卷9，頁191。高麗一朝音樂有唐樂、雅樂、鄉樂三大類，唐樂傳自中國，雅樂為禮儀使用，唐樂與雅樂有時混同，至於鄉樂則為本地音樂。關於宋代唐樂之傳入高麗，見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編，《韓國學基礎資料選集—中世篇》（城南市：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頁593-595。

㉔ 鄭麟趾，《高麗史》，卷13，頁275。

㉕ 徽宗所賜樂器有：鐵方響、石方響、琵琶、五絃、雙絃、箏、箜篌、觱篥、笛、篪、簫、匏笙、壎、大鼓、杖鼓、栢板等。見鄭麟趾，《高麗史》，卷70，頁535-536。

㉖ 睿宗十年（1115，宋徽宗政和五年）：遣進士五人赴太學「伏望皇帝陛下愍惻深衷，推明故事，特下國子監，或於璧雍收管，許令就便學業則容迹於諸生之末……」，見鄭麟趾，《高麗史》，卷14，頁279。

㉗ 鄭麟趾，《高麗史》，卷70，頁5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致，宋傳達出希望與高麗交好，期望兩國關係如同樂鐘的樂音一般和諧。㉘

1116年秋，高麗睿宗派遣李資諒使宋，答謝宋徽宗賜大晟樂。㉙ 李出使汴京期間，正是徽宗的宮廷禮器陸續鑄造完成之際，徽宗更將新成禮器賜與大臣，以為家廟祭器，流傳至今日的「政和鼎」就是在此時完成的（圖1）。㉚ 這件器物是少數留存至今的徽宗「新成禮器」，原來是賜給童貫家廟之用，器形仿自商晚期鼎，主體裝飾典型獸面，銘文格式則仿自西周，綜合了商周銅器特點。除了將新成禮器賜給大臣家廟之用外，徽宗也在隔年（1117）三月庚寅賜給高麗新成祭器。㉛ 值得注意的是，後來負責編纂《宣和博古圖》的王黼奉命招待高麗來使李資諒，不知是否與李資諒有特殊情誼，還上奏為李資諒在史館中記下一筆。㉜

十二世紀二〇年代，隨著金的壯大，高麗的戰略地位更形重要，為尋求高麗支持，徐兢（1091－1153）在宣和中隨使高麗，回國後撰成《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序於1124年），紀錄了他在出使高麗途中的見聞，包括該國的地理、風土民情、器用制度等。除了文字紀錄之外，由於徐兢雅好丹青，原書配有他

㉘ 關於賜樂與樂器在宋、麗外交之角色，尤其是1069－1126年間，見Keith L. Pratt, “Music as a Factor in Sung-Koryŏ Diplomatic Relations 1069-1126,” pp. 199-218; Keith L. Pratt, “Sung Hui Tsung’s Musical Diplomacy and the Korean Response,” pp. 509-521. 關於大晟樂傳入高麗及後續發展的史料彙考，見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編，《韓國學基礎資料選集—中世篇》，頁600-605。

㉙ 睿宗十一年（1116，宋徽宗政和六年）:「（秋七月）己酉，遣李資諒、李永如宋，謝賜大晟樂。」見鄭麟趾，《高麗史》，卷14，頁284。

㉚ 國立故宮博物院，《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頁100。

㉛ 「三月庚寅，賜高麗祭器，高麗進士權適等四人賜上舍及第」，見脫脫，《宋史》，卷21，頁397。

㉜ 「（徽宗政和七年）三月十五日，館伴王黼、同館伴范訥奏：『臣切惟陛下寵眷三韓，去年其王侯遣陪臣李資諒、李允繼歲入貢，召同輔臣燕于睿謨殿。中席，資諒永跋望清光，躊躇感戀，相顧涕泗被面，淚墮酒中，見者為之太息。伏望聖慈付之史館。』從之。」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冊8，頁78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沿途所繪之圖，惜在靖康難後便已亡佚。㉝ 在徐兢的高麗行中，他特別注意到高麗樂舞之可觀，它認為原因之一便是「熙寧中王徽嘗奏請樂工，詔往其國，數年乃還。後人使來，必齎貨奉工技為師，每遣就館教之。比年入貢，又請賜大晟雅樂即請賜燕樂，詔皆從之，故樂舞益盛可以觀聽。」㉞

宋、麗關係在政和年間達到頂點，高麗幾乎每年均派遣使者如宋，徽宗也極盡所能地拉攏高麗，甚至賜御筆書畫，這些御筆書畫雖不一定為徽宗出自徽宗之手，但顯見徽宗對高麗的重視。㉟ 此時正是宋徽宗禮制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無論是大晟樂或是新成祭器，均賜與高麗，在宋與周邊的關係中這是十分特殊的。㊱ 此一連串帶有強烈政治目的的使節交流使得徽宗的新成禮、樂器流布海東，部份並為後來的朝鮮王朝所繼承。許多在中國已不見的禮樂器、制度，仍可在今日的韓國找到遺緒。㊲

㉝ 見「宣和奉使高麗，詔路允迪、傅墨卿為使介，其屬徐兢，倣元豐中王雲所撰雞林志為高麗圖經，考稽詳備，物圖其形，事為其說，蓋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先人在歷陽，雖得見其圖，但能抄其文，略其繪畫。乾道間刊于江陰郡齋者，即家間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參周煇著，劉永翔校注，《清波雜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7，頁323-324。

㉞ 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卷40，頁6。

㉟ 睿宗十二年（1117，宋徽宗政和七年）:「癸亥，命置天章閣于禁中，藏宋帝所賜親製詔書及御筆書畫。」見鄭麟趾，《高麗史》，卷14，頁287。不過所謂御筆書畫是否真為徽宗所書，那是另一個問題。在政治場域中，是否為徽宗親筆所書也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這些作品得到徽宗的認可。相關討論見Maggie Bickford, "Huizong's Paintings: Art and the Art of Emperorship," in Patricia B.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453-513.

㊱ 「政和中，升其使為國信，禮在夏國上，與遼人皆隸樞密院；改引伴、押拌官為接送館伴。賜以大晟燕樂、籩豆、簠簋、尊罍等器，至宴使者于睿謨殿中。」脫脫，《宋史》，卷487，頁14049。

㊲ 韓國今日的孔廟祭典樂章仍以「安」命名，沿用宋代大晟樂府之釋奠樂名，見 Robert C. Provine, *Essays on Sino-Korean Musicology: Early Sources for Korean Ritual Music*, pp. 125-126；沈暘，〈李氏朝鮮時期都城文廟祭孔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3期，頁79-98。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二、高麗（918－1392）中期以後的仿古銅青瓷

使節所帶回的大量宋朝禮樂器，除了用於朝廷儀典之外，對高麗時期的文化還產生什麼影響呢？時至今日，最顯著可見的便是在十二世紀的高麗青瓷出現了一股仿商周古銅器的作風。高麗青瓷是在中國之外，受到越窯影響最早燒成的青瓷之一，徐兢隨使高麗時曾看到「翡色」狻猊出香，一般認為即高麗青瓷。㊳ 到了南宋，賞鑒家甚至稱高麗青瓷為「天下第一」，他處所造均不及。㊴ 二十世紀早期以來高麗青瓷也引起陶瓷學界的廣泛重視，討論課題包括：高麗青瓷是燒成於九世紀初、㊵ 九世紀末十世紀初、㊶ 還是十世紀下半，㊷ 與中國

㊳ 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2，頁2。關於高麗青瓷「翡色」的含意及其與越窯關係的早期研究整理，見G. St. G. M. Gompertz, "The 'Kingfisher Celadon' of Koryo," *Artibus Asiae* 16, no. 1/2 (1953), pp. 5-24. 此文對於早期英、日文研究有不錯的整理，然關於越窯之討論在寺龍口越窯址發現後顯然已過時。
從技術層面探討越窯對高麗青瓷窯的影響，見金英美，〈越窯製瓷技術向高麗青瓷的傳播與影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5輯（2002），頁201-225。

㊴ 最常被引用的一條資料是南宋太平老人的《袖中錦》，裡面提到：「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高麗秘色……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見太平老人，《袖中錦》，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5），子101，頁385。

㊵ 目前所見高麗青瓷最早之紀年器為1989年在北韓的黃海南道白川郡円山里窯址發現數件「淳化三年（992）」銘太廟祭器破片，類似還有一件藏於南韓梨花女子大學校「淳化四年」太廟祭器。有學者認為在此批祭器出現之前，高麗青瓷應已有一段燒造歷史。鄭良謨從越窯璧形足底的流行時間，推測中國的青瓷燒造技術在九世紀初東北亞海上貿易之王張保皐引進下，傳入高麗，見鄭良謨著，金美英譯，金光烈校，《高麗青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9-25。

㊶ 伊藤郁太郎認為目前所見淳化款祭器可能具有保守尚古作風，不能代表當時高麗青瓷的最高水準，根據窯址與越窯的編年資料，青瓷的燒造應可推至九世紀末、十世紀初，見伊藤郁太郎，〈高麗青磁をめぐる諸問題—編年論を中心に〉，《東洋陶磁》，第22期（1992-94），頁5-17。

㊷ 也有學者根據紀年資料，結合高麗成宗一朝引進宋代朝儀制度，推定高麗青瓷的出現最早只能到十世紀下半，見尹龍二撰，李炳瓚譯，〈高麗青磁の起源〉，《東洋陶磁》，第22期（1992-94），頁33-40；尹龍二著，片山まび譯，《韓國陶瓷史の研究》（東京：淡交社，1998），頁122-130。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瓷窯如：越窯、耀州窯、汝窯在技法與器形的關係、如何編年、㊸作為貿易陶瓷出口的情況如何㊹等，以上日、韓、中各地的陶瓷學者有諸多研究。限於語言，筆者對於韓文報告與研究無法完全掌握，主要透過中、英、日文的轉介。㊺以下就根據筆者所掌握的材料，嘗試討論高麗青瓷中仿商周古銅器的問題。

就目前資料所見，有一批高麗青瓷具有商周古銅器的特徵，這些瓷器裝飾技法均為印花，不見鑲嵌，韓國學者均訂為十二世紀。這些瓷器與南宋時期的發展趨勢一致，此時由於古器物圖錄的散布，中國南方瓷窯開始大量製造仿商周銅器的瓷器，如：仿鼎、鬲作為香爐，仿觚、尊、觶作為花瓶。㊻在南宋時期的窯址中有所出土，㊼也有來自紀年墓或遺址、年代較無爭議的仿古銅瓷器例證，如江西省樟樹市南宋端平三年（1236）墓的青白瓷鼎式爐（圖2）、㊽同地區景定三年（1262）墓的白釉鬲式爐、㊾浙江德清縣咸淳四年（1268）吳奧

㊸ 高麗青瓷的編年早段仰賴幾座紀年的高級墓葬，晚段則加入干支銘器，伊藤郁太郎，〈高麗青磁をめぐる諸問題—編年論を中心に〉，頁5-17；鄭良謨撰，李炳瓚譯，〈干支銘を通して見た高麗後期象嵌青磁の編年〉，《東洋陶磁》，第22期（1992-94），頁19-31。Yutaka Mino, "A Re-Examination of an Inlaid Celadon Mae-byong Decorated with Cranes and Clouds," *Archive of Asian Art,* no. 39 (1986), pp. 71-74；謝明良，〈對於史天澤墓的一點意見—兼評〈石家莊後太保村史氏家族墓發掘報告〉〉，《故宮文物月刊》，第20卷第1期（2002），頁76-103。

㊹ 今井敦，〈海を渡つた高麗青瓷〉，《Museum 東京國立博物館美術誌》，第503期（1993.02），頁25-33；馬爭鳴，〈中國出土的高麗青瓷〉，《東方博物》，第33輯（2009年4期），頁59-65。

㊺ 關於高麗青瓷的研究，見鄭良謨著，金美英譯，金光烈校，《高麗青瓷》。高麗青瓷簡短的研究回顧，參見金立言，〈高麗青瓷研究基礎問題〉，《故宮文物月刊》，第18卷第5期（2000），頁58-73；片山まび，〈從亞洲觀點看高麗青瓷—以研究史所見的對外關係為中心〉，《故宮文物月刊》，第24卷第11期（2007.02），頁38-45。關於韓國陶瓷史，見尹龍二著，片山まび譯，《韓國陶瓷史の研究》。

㊻ 「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謂香爐，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為之，爵爐則古之爵，狻猊爐則古之踽足豆，香毬則古之鬻，其等不一，或有新鑄而象古為之者。」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1985），冊50，頁184。

㊼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景德鎮湖田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圖版10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寺龍口越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227，圖309、311、314，頁282，圖421。

㊽ 張柏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第14冊，圖63。

㊾ 張柏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4冊，圖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墓出土的龍泉窯瓶與鬲式爐（圖3）、浙江麗水市德祐元年（1275）潘氏墓出土的龍泉窯六角瓶。[50] 還有浙江錢清鎮環翠塔出土的龍泉窯奩式爐，出土時置於「咸淳乙丑（元年，1265）六月廿八日辛未」石函中。[51] 從這個大脈絡來看，這批高麗青瓷更具體的時間應當在十二世紀下半以後，甚至可能晚到十三世紀。雖然數量不多，但這批瓷器表現各不相同，有的與商周青銅器接近，有的則表現出明顯的轉化與變形。

高麗青瓷中表現與商周古銅器最接近的是藏於韓國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的一件香爐，造型為商晚期方鼎，器表模印獸面紋，獸面之上為夔紋帶；在此件器物的外底還有一組刻劃銘文，上為亞形族徽，下方有幾個不太清晰的文字符號（圖4）。[52] 此件器物對古銅器特徵的掌握相當不錯，無論在器形比例、紋飾細節上都很接近河南安陽出土的商晚期方鼎（圖5）。[53] 若無可靠的參考作品，應該不太容易掌握銅器的器形比例與花紋細節。

南宋時期，北宋的古器物圖錄《考古圖》與《宣和博古圖》開始被用來當作器物製作時的參考書，時而可見模仿自這兩本圖錄的仿製古銅器，[54] 這件十二世紀的高麗青瓷是否也是從圖錄而來呢？經比對《考古圖》與《宣和博古圖》之後發現的確如此，中央博物館的這件青瓷方鼎與《宣和博古圖》卷一所載的「商召夫鼎」器形、花紋皆同，銘文的外觀形似但筆畫細節含糊（圖6），[55] 可見高麗陶工對商代金文相當陌生。《宣和博古圖》中徽宗的大臣釋此銘文為「亞形中召夫，子辛月◯過」，今日學者將之讀為「亞㚔孤竹」。由此可知，中央博物館的方鼎形香爐的確是來自《宣和博古圖》，與南宋的發展一致。宋朝文人士大夫的好古風氣影響到陶瓷器的設計，並在東亞陶瓷交流中，進一步傳遞到高麗。

---

[50] 浙江省博物館，《浙江紀年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圖版215、216、220。

[51] 浙江省博物館，《浙江紀年瓷》，圖版214。

[52] 鄭良謨、秦華秀，《高麗陶瓷銘文》（서울：國立中央博物館，1992），頁20，圖9。

[53]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冊2，圖版43。

[54] 目前所見仿自《考古圖》、《宣和博古圖》的器物主要出土自四川與杭州。關於杭州出土的這類仿製古銅器之討論，參見許雅惠，〈南宋金石收藏與中興情結〉，《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1期（2011），頁1-60。

[55] 宋徽宗敕編，《宣和博古圖》，至大重修本，卷一，頁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目前並無法確知中央博物館的方鼎是直接轉譯自圖錄，還是本於一件青銅製品。一般說來，圖錄的描繪有將立體作品平面化、呆板化的趨勢，因此如果直接抄摹圖錄，主體紋飾很容易變得扁平、缺乏空間感，這在明晚期的仿古銅器經常可見。[56] 從照片看來，這件方鼎的器形比例與紋飾細節的掌握均佳，也許有類似的青銅器或仿製古銅器作為陶工的參考。另一件忠實之仿古銅高麗青瓷是藏於大阪東洋陶磁美術館的圓鼎（圖7），[57] 該器造型與花紋均佳，也有可能是來自高品質的仿古器物。發現於韓國新安外海，時代約元至治三年（1323）的沈船中曾打撈出數量不少的元代仿古銅器，其中一件銅鼎器身的裝飾花紋就和藏於大阪的高麗青瓷鼎相近（圖8），[58] 也許是宋元時期流行的仿古紋飾。新安沈船雖然年代較晚，但它從慶元（寧波）出港後可能停泊不同港口，轉運不同地區的產品與貨品，[59] 提供了一個例證讓我們思考宋元時期仿古銅器流傳到韓國、日本的情況：為什麼這類型的銅器會出現在新安沈船？它們在日、韓被視為當代實用器、還是古董？使用情形如何？是否仍具有三代的象徵？目前我們對於這些課題所知相當有限，是將來研究應該注意的。

忠實模仿圖錄的高麗青瓷據筆者目前所見僅此一例，多數高麗仿銅青瓷器是帶著較多的自我表現。造型多半來自於鼎，為帶有三足、二立耳的容器，不過腹部明顯加深，大概是出於實用考量；三足則變得相當低矮，以穩定器身

---

[56] Robert Poor, "Notes on the Sung Dynasty Archaeological Catalogs,"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no. 19 (1965), pp. 33-44. 李玉珉，《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頁95-96。

[57]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青磁への誘い》（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1992），頁46，圖34。

[58] 국립중앙박물관（國立中央博物館），《마음을담은그릇：신안香爐》（서울：국립중앙박물관，2008），頁15。

[59] 久保智康有新的發現，他從新安沈船中出水的金屬器（尤其是仿古類型青銅器）與日本寺廟出土品的比對推測，當中有不少應為輸出至日本的商品，但並非均針對日本市場，例如銀器以及罕見於日本的銅器造型便可能是為了韓國市場，見久保智康著，彭濤譯，〈新安沈船裝載的金屬工藝品：其特點以及新安沈船返航的性質〉，頁142-154、141。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圖9、10）。[60] 花紋也有不同程度的變形，藏於首爾的國立中央博物館的獸面紋香爐尚保留雷紋地上裝飾獸面的作風（圖9），[61] 但藏於梨花女子大學校的香爐腹部，則只見散布的雷紋，主體動物已不可辨（圖10）。[62] 在全羅南道康津郡的沙堂里窯址曾出土過一塊陶片，與前述中央博物館香爐頸肩之際的形狀與花紋相合（圖11）；[63] 另有一塊陶片之花紋（圖12）與現藏於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的方形香爐相同（圖13），曾經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報導，[64] 可知在朝鮮半島南端康津郡的沙堂里窯址是十二世紀時生產此類仿古銅青瓷的地點之一。

上述這些高麗仿古銅青瓷的作風可以和大約同時期東亞大陸上出現的仿古銅器物相比較，尤其是在杭州（南宋臨安城）及杭州附近出土者，包括銅器與陶瓷。此地區出土的銅器有完全仿自《宣和博古圖》者，如發現於湖州的一件鼎。[65] 陶瓷尚未見到完整器，不過從殘片仍可看出其紋飾仿自商周古銅器，以雷紋為地，於雷紋地上再施加主體動物紋樣（圖14），[66] 目前所見多是沒有上釉的素燒陶。這類陶片曾見於緊鄰南宋皇城的烏龜山窯址，[67] 此遺址目前學界公認為南宋官窯，可能是文獻中的郊壇下官窯。在南宋首都杭州一帶出現這類較忠實的仿《宣和博古圖》器物有其背景，應與移居南方的皇室、士大夫意圖

---

[60] 相關例證參見胡德智、萬一編，《燦爛與淡雅—朝鮮、日本、泰國、越南陶瓷圖史》（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1999），頁14；梨花女子大學校博物館編，《梨花女子大學校創立100周年記念館博物館新築開館圖錄》（서울：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1990），圖版76。

[61] 胡德智、萬一編，《燦爛與淡雅—朝鮮、日本、泰國、越南陶瓷圖史》，頁14。

[62] 梨花女子大學校博物館編，《梨花女子大學校創立100周年記念館博物館新築開館圖錄》，圖版76。

[63]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青磁への誘い》，頁183，圖174-176。

[64]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青磁への誘い》，頁46，圖35；頁183，圖174-175。

[65] Ya-hwei Hsu, "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Revival of Antiquity in the Era of Print, 960-1279," pp. 209-210, figs 4.16-17.

[66] 唐俊杰，〈祭器、禮器、邵局：關於南宋官窯的幾個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6期，頁52，圖4。

[6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南宋官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彩版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延續北宋徽宗新禮與金石收藏的風氣有關。[68] 高麗青瓷忠實仿古的表現較接近於杭州地區，而與十二、三世紀時生產仿古銅類型瓷器的民間瓷窯相距較遠，包括：景德鎮湖田窯、[69] 寺龍口越窯（圖15）、[70] 龍泉窯（圖3）、[71] 耀州窯，[72] 這些瓷窯的作品多半帶有較強烈的當代色彩，推測高麗仿古銅青瓷的燒造應與開城、杭州之間的往來有關。近年來南宋臨安城的考古也出土一些高麗青瓷破片，包括高品質的所謂「翡色」青瓷與品質較粗的鑲嵌青瓷，[73] 應可視為南宋、高麗往來的另一例證。

關於高麗仿古銅青瓷的用途，一般訂為香爐，至於是為宗教祭祀用途或是貴族階級的風雅好古之物，尚待確認。十二世紀高麗的宮廷祭器樣式如何，並不太清楚，目前所見確為高麗祭器者為十世紀之作，包括一件藏於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校博物館的尊，有款「淳化四年（993）癸巳，太廟第一室享器，匠崔吉會造」（圖16），另外1989年在距離高麗時代首都開城不遠的円山里窯址也發現一些類似的「淳化三年（992）」、「淳化四年」款太廟祭器，器形可辨者有簠、簋、豆（圖17）。這些器時代較早，是高麗青瓷最早的紀年器，應該是按北宋初年聶崇義編訂的《三禮圖》所製作。[74] 在徽宗賜給高麗《宣和博古圖》系統之新成祭器後，這類按《三禮圖》製作的祭器是否繼續沿用？還是全面改製？關於這個問題，《高麗史》並無明載，僅提及有些吉禮中所使用的禮器以

---

[68] 關於南宋忠實之仿古銅器物與金石文化之討論，見許雅惠，〈南宋金石收藏與中興情結〉，頁1-60。

[69]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景德鎮湖田窯址》，圖版104。

[7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寺龍口越窯址》，頁227，圖309、311、314，頁282，圖421。

[71] 浙江省博物館，《浙江紀年瓷》，圖版214-216。

[72]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宋代耀州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85-86。

[73] 如：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彩版44。馬爭鳴認為杭州出土的翡色青瓷品質高，為官方供品；而鑲嵌青瓷品質較粗，應為貿易瓷，見馬爭鳴，〈杭州出土的高麗青瓷〉，《東方博物》，第29輯（2008年4期），頁109-115。

[74] 南秀雄，〈円山里窯跡と開城周邊の青磁資料〉，《東洋陶磁》，第22期（1992-94），頁105-120。在討論北宋官窯是否為汝窯時，謝明良也曾論及円山里出土的太廟祭器，惟高麗仿古類型青瓷是否可作為北宋官窯側寫，尚待更多材料佐證。謝明良，〈北宋官窯研究現狀的省思〉，《故宮學術季刊》，27卷4期（2010），頁22-23。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常享器皿擔當。[75] 要到朝鮮李朝，才見大量樣式特殊的陶瓷祭器，許多仿自商周古銅器，不過它們的祖形並非高麗青瓷，也非徽宗的「新成禮器」，而是南宋、元禮圖與仿銅禮器的轉介，詳見以下討論。

三、圖籍傳播與朝鮮（1392-1910）前期祭器

如前所述，北宋徽宗為了拉攏高麗，曾賜予高麗新成樂器與祭器，因此如果朝鮮李朝宮廷中的祭器、樂器保留了徽宗禮制改革後的新成禮器系統，也不令人意外。的確，有些李朝祭器明顯可見徽宗新成禮樂器的影響，如李朝的青銅編鐘便是以徽宗的大晟編鐘為藍本，鐘的整體形狀、鐘紐鏤空蟠龍造型大致與大晟編鐘相同，只是表面紋飾相當簡省，省略了蟠虺花紋，僅在鼓部中央加上一個圓盤形突起的「隧」作為演奏時的打擊點（圖18）。[76]

然而並非所有的李朝祭器均來自徽宗新成禮器系統，而且隨著時代推移，禮器的內容、樣式也隨之變化，後期明顯受到明朝禮儀的影響，例如：韓國古宮博物館收藏的宗廟祭器當中有一套黃銅六彝，均為深腹碗形，表面鑄有象徵紋樣，置於淺盤形的舟上。這套彝、舟組合與《明集禮》描繪的六彝完全相同，可知是受到明禮的影響（圖19）。[77] 另有一件黃銅龍尊，與明宣德皇帝在世宗十二年（1430）賞賜給朝鮮的白瓷青花酒海造型、紋飾相近，應該是複製自此件青花瓷器的禮器（圖20）。[78] 關於宣德賞賜的這件白瓷青花酒海，片山

---

[75] 《高麗史》志15禮．吉禮大祀．別廟：「祝史，納神主，如常儀，祝版，燔於齋坊，若后妃別廟，則無功臣配享，禮器不設，則以常享器皿行之。」見鄭麟趾，《高麗史》，卷61，頁371。

[76] 李朝編鐘圖像見국립고궁박물관（國立古宮博物館），《국립고궁박물관개관도록（國立古宮博物館開館圖錄）》（서울：국립고궁박물관，2005），頁109。大晟編鐘圖片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頁102。

[77] 李朝後期黃銅六彝圖像見국립고궁박물관（國立古宮博物館），《국립고궁박물관개관도록（國立古宮博物館開館圖錄）》，頁98-100。明集禮六彝見徐一夔編，《明集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649，頁195-198。

[78] 黃銅龍尊見국립고궁박물관（國立古宮博物館），《국립고궁박물관개관도록（國立古宮博物館開館圖錄）》，頁94，圖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まび與一些韓國學者曾為文討論過，片山認為宣德賞賜的酒海在李朝司甕院中再生產並擴大使用，使這類青花器成為李朝王家權威象徵。[79] 從這件黃銅龍尊看來，除了青花瓷器，李朝也用金屬複製了這件政治象徵物。

本文主旨並不在全面討論朝鮮李朝祭器的發展與衍變，此範圍過大、非筆者能力所能及。也不在進行《世宗實錄》與李朝祭器之間的比對，《世宗實錄》作為李朝早期陶瓷祭器的範本如今已是學術界常識。[80] 本章節主要在討論李朝禮器是如何選擇、吸納中國的禮器系統，尤其是在李朝禮儀發展上具開創地位的世宗階段（1419－1450）。李朝在太宗（1401－1418）之時曾命大臣撰吉禮，但完整的吉、嘉、賓、軍、凶五禮制定始於世宗，實錄有載「太宗命許稠撰吉禮序例及儀式，其他則未及。每遇大事，輒取辦於禮官，一時所擬。上乃命鄭陟、卞孝文撰定嘉賓軍凶等禮，取本朝已行典故，兼取唐宋舊禮及中朝之制，其去取損益均稟宸斷……。」[81] 此時為了制禮作樂，在李朝世宗二十一年（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更賦予使明大臣購書任務：「凡禮樂制度諸書，廣求而來。」[82] 可知圖籍文書在李朝早期移植中國禮樂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宮廷雅樂的部份，Robert C. Provine曾討論過中國圖籍對李朝的影響，[83] 本章節則以祭器為討論核心，探討來自中國的圖籍在李朝早期禮儀制定過程中的角色。

《世宗實錄》五禮的吉禮項下有完整的祭器圖說，對祭器樣制有清楚說明，當是世宗制定禮樂制度的成果。它是了解朝鮮王朝初期制禮的重要材料，也成為後來朝鮮王朝禮儀大典《國朝五禮儀》的基礎。這些禮書中的描繪成為

---

[79] 見片山まび，〈再生産される威信財—朝鮮王朝初期の祭器とその生産〉，《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94（2002.3），頁3-14。另外從窯址出土的朝鮮時期官窯瓷器也可見其與明代瓷器的關係，見伊藤郁太郎，〈朝鮮時代の官窯の成立と展開〉，頁263-269。

[80] 關於韓國學界對陶瓷、銅質祭器與世宗〈祭器圖說〉的研究整理，參見李定恩，〈三代意象的嬗變：《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頁1-4，論文發表於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2011年10月15日。

[81] 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서울：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冊五，頁176。

[82] 世宗21年（1439）9月3日紀錄，見《朝鮮王朝實錄》，冊4，頁234。

[83] Robert C. Provine, *Essays on Sino-Korean Musicology: Early Sources for Korean Ritual Music*, pp. 66-1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朝早期祭器製作的依據，指導祭器的造型與花紋。[84] 因此本節便以《世宗實錄．五禮．吉禮序例．祭器圖說》（1452）作為討論對象，根據「祭器圖說」中所列的參考書籍，分析在朝鮮早期禮儀訂立的過程中，世宗與他的大臣參考了哪些來自漢地的資料、圖籍，如何取捨。這些書籍的時代、性質不一，跨越北、南宋、到元朝，但歸根究底仍為北宋金石收藏與徽宗禮制改革之遺緒所影響。以下就「祭器圖說」提到的圖籍分別討論之。

（一）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世宗實錄》最重要的參考書為「朱文公《釋奠儀式》」，有時也簡省作《釋奠儀》，此書即為朱熹所編《紹熙州縣釋奠儀圖》。[85] 在本文引言曾提到這本書是朱熹任地方官時，有感於州縣釋奠文宣王孔子仍因循《三禮圖》之陋，不見新成禮器氣象，因而屢次上書朝廷的結果。換句話說，《釋奠儀圖》一書是徽宗新成禮器傳播於地方州縣之重要媒介。在朱學發達後，《釋奠儀圖》成為元代州縣釋奠文宣王之重要參考，許多文廟祭器均循此規制。

《釋奠儀圖》一書是如何傳入朝鮮半島？據載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高麗忠烈王十六年，1290）時，高麗集賢殿大學士安珦（1243－1306）赴元，在元大都得到新刊《朱子全書》，遂手抄此書，攜回高麗，為朱子學傳入高麗之始。[86] 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安珦再次居留燕京，此次他到文廟拜謁，在文廟學官的詢問下，安珦答「我國文物祀典一遵華制，豈無聖廟耶」。[87] 但實情卻是高麗國子監屢經兵火已破敗不堪，於是安珦在忠烈王二十七年（1301）將自己宅舍獻給朝廷作為國學，[88] 並在忠烈王二十九年（1303）派博士金文鼎至中國江南摹繪孔子與七十弟子像，並求祀孔祭器、樂器、以及六經諸子回國。[89] 值

[84] 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冊五，頁178-187。

[85] 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百部叢書集成。

[86] 「留燕京，手抄朱子書，摹寫孔子朱子真像。篤好知為孔門正脈，手錄其書，摹寫孔朱真像而歸。」見安珦，《晦軒先生實紀》，韓國歷代文集叢書（서울：景仁文化社，1999），冊35，頁69。

[87] 「留燕京，謁文廟。學官問東國亦有聖廟耶，先生曰：我國文物祀典一遵華制，豈無聖廟耶。」安珦，《晦軒先生實紀》，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35，頁75。

[88] 安珦，《晦軒先生實紀》，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35，頁77。

[89] 鄭麟趾，《高麗史》，卷105，頁322-3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得注意的是，之所以派博士去江南收購經籍的主要原因是「聞江南猶存宋室禮物又多朱子新書」。⑨⓪《釋奠儀圖》與相關祭器制度大概是在這個背景下首度傳入高麗，後來朝鮮王朝初期，明成祖永樂元年（李朝太宗三年，1403）又曾賜與《朱子全書》一部。⑨①

《世宗實錄》中來自《釋奠儀》的祭器有：籩、豆、簠、簋、俎、篚、爵、坫、冪尊疏布巾、著尊、壺尊、大尊、龍勺、洗罍、洗。比較《世宗實錄》與《釋奠儀圖》的器物描繪，兩者的承襲關係毋庸置疑，但變形之處也不少。以簠、簋為例，《世宗實錄》大體仍保留了《釋奠儀圖》中所描繪的方器、圓器外形，但簠、簋蓋頂端波形紐則變得相當難以理解（圖21）；紋飾方面的變形也很顯著，如簋蓋與腹的抽象紋飾成為花朵形（圖22）。

這個清單中值得注意的是，《世宗實錄》並沒有對《釋奠儀圖》照單全收，以六尊為例，《世宗實錄》只取著尊、壺尊、與大尊三者，山尊、犧尊、象尊三器則另有來源。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犧、象尊的描繪，關於這兩件禮器應作何形，一直以來是漢地禮家爭論的焦點。《世宗實錄》略過朱子《釋奠儀圖》之徽宗新制，而採用陳元靚《事林廣記》所載之《三禮圖》傳統，關於這點，詳見《事林廣記》一節。

訂為十五世紀的朝鮮粉青沙器中有許多即與《世宗實錄》中的描繪相當接近，應該是本於實錄，器類包括簠（圖23）⑨② 、簋、犧尊、象尊與著尊（圖24、25）⑨③ 等，就目前出版資料看來，韓國首爾的湖林博物館是主要的收藏中心之一。⑨④ 雖說是根據《世宗實錄》的規定，但簠蓋頂銳利的波浪邊緣與俐落的環

---

⑨⓪ 安珦，《晦軒先生實紀》，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35，80。

⑨① 太宗3年（1403）10月27日，原文作「朱子成書」，見《朝鮮王朝實錄》，冊1，頁282。

⑨② 佐川美術館編，《韓国ソウル湖林博物館所藏李朝陶磁の名品—白磁と粉青沙器》（滋賀：佐川美術館，2006），頁83，圖63；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粉青沙器》（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1996），頁20，圖55。

⑨③ 佐川美術館編，《韓国ソウル湖林博物館所藏李朝陶磁の名品—白磁と粉青沙器》，頁90，圖70。

⑨④ 此本圖錄收錄了大量粉青沙器祭器，其類型的劃分便是對照《世宗實錄》中的祭器圖說，見호림박물관（湖林博物館），《분청사기제기粉青沙器祭器》（선울：호림박물관，2010）。筆者要感謝謝明良教授提供這個資料並慷慨出借此書。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形紐帶有金屬器的特點，另外，湖林簠的波浪邊緣似為透空，中間可見半透明的釉，這些特點均與湖南慈利出土「大德乙巳」（1305）款的元代銅簠接近（圖26），此件器物有題識「大德乙巳（1305）靖州達魯花赤脫歡等、知州許五略、判官田進義、吏目郭中等謹識云」，為靖州（湖南靖縣）地方祭器。[95] 朝鮮瓷簠帶有元代銅簠特點，說明了製作的陶工也許見過類似的金屬器。在新安海底沈船中曾發現一些元代的仿古銅香爐、花瓶，[96] 應該有一些元代鑄造的祭器在高麗晚期朝鮮早期時被帶到海東。

隨著朝鮮陶瓷祭器自身的發展，簠、簋逐漸遠離《世宗圖錄》中的描繪，僅餘方、圓器形以資區別，十七世紀以降器形更接近日用白瓷器皿，僅以扉稜為識（圖27）。[97]

（二）陳祥道《禮書》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所載乃州縣釋奠文宣王所用禮器，與中央朝廷祭祀社稷、宗廟所使用禮器並不相同，如朝廷禮儀六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犧尊、象尊）、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俱備，但地方釋奠文宣王只用六尊，不用六彝，這些《釋奠儀圖》不載的器物，《世宗實錄》便以陳氏《禮書》作為參考。所謂陳氏即北宋陳祥道（1053－1093），其著《禮書》總150卷，歷時二十年，於宋哲宗元祐（1086－1094）年間表進於朝。[98] 此書對宋代的禮、祭器製作是否有影響，尚待評估。不過由於卷帙龐大，收羅廣泛，南宋《玉海》稱其「凡歷代諸儒之說及近代聶氏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缺，於禮學最詳。」[99]《禮書》之所以被引介入李朝，不知是否是

---

[95] 劉廉銀，〈慈利縣出土的元代銅簠〉，《文物》，1984年5期，頁81。

[96] 文化公報部編，《新安海底遺物》（東京：同和出版社，1983），頁113、116、117、123、124、130。

[97] 參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天にささげる器：朝鮮時代の祭器》（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08），圖17。

[98] 參「進禮書表」，陳祥道，《禮書》，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3（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頁1。

[99] 轉引自趙士煒，《中興館閣書目輯考》五卷續目一卷，中國歷代書目叢刊（北京：現代出版社，1987），頁4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為其於禮學最詳。

《世宗實錄》來自《禮書》者包括：甗、鉶、雞彝、鳥彝、罍彝、黃彝、匕、扈、几（圖28上）。[100] 不過今日所見最早的《禮書》刊本為元至正七年（1347）福州路儒學刊明修本，書中器物的描繪十分簡略，細節多無法辨識（圖28）。《世宗實錄》的器物描繪遠較福州路《禮書》刊本清晰，朝鮮也許得見其他版本。

（三）陳元靚《事林廣記》

至於祭器所必備的犧尊、象尊，《世宗實錄》捨朱熹《釋奠儀圖》（圖29）不用，而採用陳元靚（1137－1181）《事林廣記》中的描繪（圖30），并抄錄《事林廣記》的圖說如下：「《事林廣記》云：犧尊，飾以牛於尊腹之上……」、「《事林廣記》云：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除了犧尊、象尊之外，採自《事林廣記》的還有釜、鑊。本書目前尚存數個版本，內容也頗有差異，[101] 比較《世宗實錄》與現存時代較早的《事林廣記》，發現它與元至順年間（1330－1333）建安椿莊書院刊本的圖像描繪相近、圖說內容完全相同，很可能是採用此本。[102] 此本特點是一器一圖，新舊禮器系統並陳而以《三禮圖》之舊傳統占上風，僅在鼎、爵可見徽宗所制定的新成禮器樣式。[103] 整體看來，應是椿莊書院編輯整理後的結果。

《事林廣記》並非禮書，而是日用類書，內容包羅萬象，在椿莊書院本中祭禮器收錄在「器用類」。取自《事林廣記》的犧、象尊二器造型曾是漢地歷代禮家爭論的焦點，宋初聶崇義集諸家所纂之《三禮圖》便羅列了犧、象尊兩種不同解釋與樣式：一是釋犧、象為具象動物，而在器腹畫犧、象之形；另一則是釋犧為婆娑、象為以象骨為飾，因此犧尊器腹繪鳳凰、象尊則裝飾象牙

[100] 陳祥道，《禮書》，頁388、380、368、390、177、188。

[101] 關於此書版本的討論，參見胡道靜與森田憲司文，收錄在陳元靚，《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559-572。

[102] 陳元靚，《事林廣記》（元至順間建安椿莊書院刻本），續修四庫全書，冊12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頁377。

[103] 陳元靚，《事林廣記》，頁376-3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1）。[104] 宋代考古金石發達之後，推翻了《三禮圖》的這些說法，而將考古所見、背上開孔的動物造型容器訂為犧尊、象尊，如《宣和博古圖》、《釋奠儀圖》（圖29）所錄。李朝世宗的大臣對於漢地犧尊、象尊的爭議也有所悉，曾於世宗六年（1424）時提議「依《周禮》畫腹鑿背，兩存之」，[105] 不知為何後來編成的「祭器圖說」僅存「畫腹」一類，明顯違背了朱熹《釋奠儀圖》的「鑿背」樣式。

《世宗實錄》中對於犧、象尊的描繪也有值得注意之處，相較於《事林廣記》之簡略粗率，《世宗實錄》的描繪具體明晰，為何會出現抄摹本較母本清晰的情況？事實上，李朝官員應該對《事林廣記》圖式的最終來源—《三禮圖》—並不陌生，因為這本書至少在十世紀便已傳入高麗，[106] 992年高麗成宗的太廟祭器便受到《三禮圖》影響，高麗文宗十三年（1059）官員還曾雕印《三禮圖》以進：「庚辰，知南原府事試禮部員外郎李靖恭進新雕三禮圖五十四板，孫卿子書九十二板，詔置秘閣，仍賜衣襨」。[107] 既雕有印板，應該也有印本流傳，這或許是《世宗實錄》的犧、象尊描繪比《事林廣記》還好的原因之一。

《世宗實錄》中「畫腹」的犧、象尊稍晚還是被改易為朱熹《釋奠儀圖》中的「鑿背」樣式，這似始於《國朝五禮儀》（1474），[108] 此樣式為十八世紀的《宗廟儀軌》（1706－1800編纂）[109] 與十九世紀的《社稷署儀軌》（1820－1846）[110] 所繼承。類似的改變也見於十五至十八世紀的李朝祭器，從粉青線刻

---

[104] 聶崇義，《新定三禮圖》，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191。

[105] 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冊2，卷23，頁574。

[106] 學界最常引用的一條資料是高麗成宗二年（983，宋太平興國八年）：「五月甲子九日……博士任老成至自宋，獻大廟堂圖一鋪并記一卷、社稷堂圖一鋪并記一卷、文宣王廟圖一鋪、祭器圖一卷、七十二賢贊記一卷。」見鄭麟趾，《高麗史》，卷3，頁67-68。

[107] 鄭麟趾，《高麗史》，卷8，頁168。

[108] 筆者並未能取得《國朝五禮儀》一書，關於此書之犧、象尊描繪是參考片山まび，〈再生産される威信財—朝鮮王朝初期の祭器とその生産〉，頁9。不過片山まび認為《國朝五禮儀》中犧、象尊的改變是受到《明集禮》的影響。

[109] 《宗廟儀軌》（上）（서울：서울大學校奎章閣，1997），頁38-39。

[110] 據本儀軌，此時祀社稷只用象尊，不見犧尊，見《社稷署儀軌》（서울：서울大學校奎章閣，1997），頁41-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象紋尊（圖32）⑪ 變為白瓷象形尊（圖33），⑫ 陶瓷作品與圖籍描繪之間雖有一定距離，但犧、象造型之轉變是一致的。

《事林廣記》之傳入朝鮮發生在公元1401年（明惠帝建文三年，李朝太宗元年），為使明使節李舒返國時所獻，同時進獻的還有《大學衍義》、《通鑑集覽》。⑬ 自此之後，在太宗、世宗朝成為禮儀重要參考書籍，《朝鮮王朝實錄》中屢見大臣徵引、討論。⑭

（四）阮逸、胡瑗《皇祐新樂圖記》

在《世宗實錄》中有一些器物的來源為《聖宋頒樂圖》，包括牛鼎、羊鼎、豕鼎、鸞刀等四器，由書名顯見是來自宋代的樂器圖譜，經由圖像比對可確定為宋仁宗年間阮逸、胡瑗所編的《皇祐新樂圖記》。⑮ 該書原來是仁宗朝樂器改革的紀錄，作者阮逸、胡瑗為當時主其事者。⑯ 根據《皇祐新樂圖記》「總敘詔旨」所記，於皇祐二年（1050）時，仁宗深感樂器之音律未協、形制不合古法，因而詔令大臣阮逸、胡瑗改制樂器。阮、胡二人在皇祐五年（1053）完成新制樂器後，將始末與新成樂器樣制輯錄一書，是為《皇祐新樂圖記》。阮、胡二人改制之時曾參考宮中所藏的上古樂器，其中可能包括收錄在《宣和

⑪ 全羅南道光州市忠孝洞窯址出土，轉引自片山まび，〈再生産される威信財—朝鮮王朝初期の祭器とその生産〉，頁6，圖3。

⑫ 지대학교박물관（明知大學校博物館）《백자제기、禮와藝가만나다（白瓷祭器：禮與藝的交會）》（용인시：명지대학교박물관，2010），頁24-35。佐川美術館編，《韓国ソウル湖林博物館所藏李朝陶磁の名品—白磁と粉青沙器》，頁58。

⑬ 太宗元年（1401）12月9日紀錄，見《朝鮮王朝實錄》，冊1，頁219。

⑭ 太宗朝之徵引討論，見太宗11年1月15日、12年1月15日、14年10月18日。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冊1，頁575、621；冊2，頁42。網路全文搜尋：http://sillok.history.go.kr（1/31/2012）。

⑮ Keith L. Pratt 在研究高麗樂器時，也曾提到朝鮮文獻所見的《大宋頒樂圖》就是《皇祐新樂圖記》，不過並未進一步討論其內容、圖說，Pratt並推測此書也許是在1076年高麗使節崔資諒出使宋朝時所帶回，見Keith L. Pratt, “Sung Hui Tsung’s Musical Diplomacy and the Korean Response,” p. 516.

⑯ 阮逸、胡瑗，《皇祐新樂圖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冊211，頁1-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博古圖》中的「周寶和鐘」。⑰

比對《皇祐新樂圖記》與《世宗實錄》中的牛、羊、豕鼎，可見兩者插圖基本相同：在主禮器「鼎」之外，上方有覆蓋的「冪」與供抬舉用的「扃」，右方有插肉的「畢」（圖34）。鼎足造型與器名相稱，牛鼎飾牛頭、羊鼎飾羊頭、豕鼎飾豕頭；器身筒形，口沿立兩耳。《皇祐新樂圖記》之鼎器身有銘文，內容為「皇祐癸巳歲九月X卯朔十二日戊寅，詔有司鑄其鼎……」，這個鼎銘大概不合於李朝之用，因而在《世宗實錄》中改易為雷紋裝飾帶。

《皇祐新樂圖記》撰成於宋、麗雙方中止官方往來之時，此書大概不可能於此時經由外交管道傳入高麗，比較可能是傳入於宋、麗外交恢復之初（十一世紀下半）。十二世紀早期宋徽宗將新製的大晟樂與仿古樂器賜給高麗，然而《皇祐新樂圖記》的樂器樣式並未被新制取代，製作於李朝後期的鐘仍有遵循此書者（圖35），與徽宗之新樂並存。⑱ 反觀中國，在歷經政爭、禮制改革、與朝代更迭之後，《皇祐新樂圖記》樣式的器物可能早在南宋便已不存，僅餘一書以為證。

（五）《周禮圖》

另有山罍、圭瓚、筵的來源為《周禮圖》，根據樂器的描繪，Robert C. Provine認為這本書是附在《纂圖互註周禮》前方的「周禮經圖」，且根據內文有「今大晟樂」字句，他推估此書纂輯時間在1110－1125年。⑲ 從《世宗實錄》山罍、圭瓚、筵的描繪看來，Provine推論《周禮圖》來自《纂圖互註周禮》的「周禮經圖」應該是正確的（圖36），這本書傳入韓國後，在當地又

⑰ 據歐陽修的紀錄，這套編鐘是仁宗景祐（1034－1037）修大樂時所發現，後藏於太常寺，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134，頁1042。圖像見宋徽宗敕編，《宣和博古圖》，至大重修本，卷22，頁23a、24a、25a。

⑱ 국립고궁박물관（國立古宮博物館），《국립고궁박물관개관도록（國立古宮博物館開館圖錄）》，頁112，圖66。

⑲ Robert C. Provine, *Essays on Sino-Korean Musicology: Early Sources for Korean Ritual Music*, pp.105-115. 筆者要感謝李定恩與我討論「周禮經圖」在朝鮮的重刻與再出版，這讓我重新審視《纂圖互註周禮》的重要性。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重刻出版。[120] 不過《纂圖互註周禮》現存最早為南宋建本，它的初纂時代是否可追溯至徽宗，有待商榷。最直接的證據在於有些插圖旁標注「禮器局」，這個單位有別於徽宗的「禮制局」，是宋高宗在紹興十四、五年時所創立，曾在紹興十五年底（1145）頒發禮器樣式《紹興製造禮器圖》到地方以為州縣參考。因此，《纂圖互註周禮》中凡標注「禮器局」或「禮局樣」（圖37）者，指的應是南宋初年高宗「禮器局」頒發之樣。[121] 由此可知《纂圖互註周禮》是一整理、編輯之作，內容涵蓋不同時代與作者，南宋時期福建曾刊刻出版不少這類書籍。

《纂圖互註周禮》之成書必須要放到經學家以圖解經的傳統，此傳統由來已久，最早的《三禮圖》為東漢鄭玄所作，在唐代的《歷代名畫記》中也錄有《春秋圖》、《周禮圖》、《爾雅圖》等。[122] 宋代由於以科舉為國家取士的主要管道，使得考試參考用書大行其道，並在書中穿插圖表以輔助記憶，於是除了《纂圖互注毛詩》、《纂圖互註周禮》等書籍，[123] 也出現成套的《六經圖》，可能是歷代流傳經圖有系統的整理與增訂。最早的《六經圖》為宋代楊甲於紹興年間所編，曾刻石於昌州郡學（今四川省榮昌縣），經後人補錄在乾道元年（1165）改為印本流傳。不過宋本《六經圖》今僅存殘本二卷，為宋末建刊巾箱本，目前所見最早完本為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的信州（今江西省上饒市）府學石刻本（圖38），[124] 之後更有許多類似的《五經圖》、《七經圖》、《九經圖》等編輯出版。[125] 在這個脈絡之下，《纂圖互註周禮》中的經圖應該也是編輯整理後的結果，內容包含不同時代、作者的解釋與描繪。

來自《周禮圖》的三件器物中，山罍一器特別值得注意，朱熹的《釋奠儀圖》中描繪有山尊（圖39），但沒有山罍。《世宗實錄》雖引《禮書》說山罍

---

[120] 《纂圖互註周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2a、10a。

[121] 關於宋高宗恢復徽宗朝禮制的措施，參見許雅惠，〈南宋金石收藏與中興情結〉，頁9-18。

[122]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1985），冊53，頁120-121。

[123] 《纂圖互注毛詩》(臺北：故宮博物院，1995)；《纂圖互註周禮》。

[124] 任金城，〈木刻六經圖初考〉，《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61-64。

[125] 相關書籍參閱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7），經1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即山尊：「《禮書》云：山罍，山尊也，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但並沒有採用朱熹的山尊樣式。

經比較《世宗實錄》與《禮書》、《周禮圖》（即《纂圖互註周禮》之「周禮經圖」），可知《世宗實錄》的山罍採用的是《纂圖互註周禮》中的樣式（圖36），[126] 特點是頸部有兩個繩索形把手，頸、肩之際裝飾雷紋、腹部裝飾山紋，同時具備山雲與雲雷紋正呼應一旁圖說：「山罍，山尊也，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謂之罍者，取象雲雷慱（慱？）[127] 施，如人君下及諸臣。」有趣的是，如同《禮書》與《事林廣記》的例子一般，《世宗實錄》的描繪也較《纂圖互註周禮》來得清晰。由於李朝禮儀也深受明代影響，經查考《明集禮》（初編於洪武四年[1371]，成書於嘉靖九年[1530]），當中祀天的山罍（圖40）與《世宗實錄》所錄有相近之處，[128] 兩者均在頸部有雙耳，腹部有山紋，但《明集禮》的山罍沒有在肩部裝飾雷紋，不知是否與《世宗實錄》有關。相近實物見於十五世紀後半的李朝白瓷祭器，如藏於韓國湖巖美術館的青花鐵繪白瓷祭器（圖41），[129] 表面紋樣以青花鐵繪為之或許與青花在李朝被賦予政治權威性有關。[130]

---

[126] 查考陳祥道《禮書》現存最早刊本—至正七年（1347）福州路儒學刻明修本，在卷九十六「祀天犧尊」之後雖列有「山罍」，卻沒有圖示，見陳祥道，《禮書》，頁372。清嘉慶九年（1804）郭氏校經堂刊本雖有插圖，但僅腹部的山紋與《世宗實錄》相類，並不見雙耳與肩部雷紋，見陳祥道，《禮書》，嘉慶九年郭氏校經堂刊本（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卷96，（圖）頁1。

[127] 據《世宗實錄》所錄，此字寫作「慱」，然蒙審查人提示，古人常將「博」寫為「慱」，原文應為「雲雷『慱』施」較合理。

[128] 徐一夔，《明集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冊649，頁106。

[129] 胡德智、萬一編，《燦爛與淡雅—朝鮮、日本、泰國、越南陶瓷圖史》，頁72。

[130] 片山まび認為李朝祭器的特點之一就是複製明朝所賜祭器，他以宣德皇帝賞賜的青花龍紋酒海為例，說明類似的青花器在李朝司饔院中再生產並擴大使用，使青花成為王家權威象徵。見片山まび，〈再生産される威信財—朝鮮王朝初期の祭器とその生産〉，頁3-14。

臺灣藝術學期刊資料庫

根據圖像比對結果，以下整理《世宗實錄》中各祭器來源：

參考書籍	器物
阮逸、胡瑗，《皇祐新樂圖記》（1053）	牛鼎、羊鼎、豕鼎、鸞刀
陳祥道，《禮書》（1086－1094）	甑、鉶、雞彝、鳥彝、罍彝、黃彝 、匕、㔾、几
朱熹編，《紹熙州縣釋奠儀圖》（1194）	籩、豆、簠、簋、俎、篚、爵、坫、冪尊疏布巾、著尊、壺尊、大尊、龍勺、洗罍、洗
陳元靚（1137－1181），《事林廣記》	犧尊、象尊、釜、鑊
不著撰人，《纂圖互註周禮》	山罍、圭瓚、筵

從上表可知，《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對於中華文化的受容有其選擇性，大體而言是以朱熹的《釋奠儀圖》為主要參考，但並非照單全收，尤其是宋代禮器中較具爭議性的山尊、犧尊、象尊，《世宗實錄》選擇了與朱子傳統不同的表現。另外，《世宗實錄》參考書籍的涵蓋範圍除了禮書之外，也包括經圖、甚至類書等在中國屬於不同門類（genre）的書籍，門類的界限模糊了，無論是禮書、類書、經圖均為禮儀而服務。

這些不同門類的書籍所記載的禮器多半是歷經北宋金石勃興、徽宗禮器改革之後，再加整理推廣的結果：《禮書》是在士大夫金石收藏的背景下，對古老的《三禮圖》與禮祭器進行大規模整理；《紹熙州縣釋奠儀圖》則屏棄《三禮圖》祭器，推廣徽宗《宣和博古圖》系統的新成禮器；而作為類書的《事林廣記》則引介《三禮圖》的部份內容，使其再度成為時興的知識。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三禮圖》至少在高麗前期便已傳入，但《世宗實錄》卻選擇參考當代出版的《事林廣記》，而非直探古老的《三禮圖》。世宗與其大臣們或許是有意迴避飽受宋儒批評的《三禮圖》，也或許是要彰顯他們對「中朝」新知的掌握。《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的分析讓我們重新思考「禮失求諸野」這句古老成語，它似乎暗示邊陲對中心的文化固守，但從《世宗實錄》這個例子看來，這些在所謂文化邊陲地區所保留下來的器用習俗固然非一成不變，有時也非一脈相承，在過程中曾經歷了再包裝與再詮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語

在歷經改朝換代與政爭之後，東亞大陸上漢王朝的禮儀規章經歷一連串的改變，原來以《三禮圖》為系統的宮廷禮器，在宋仁宗時曾小規模改制，至今尚有《皇祐新樂圖記》為證，到了宋徽宗時，大規模地將地下出土文物應用在當代禮儀之中，而有新成禮器。靖康之難宋室南渡後，雖一時中斷，但紹興年間很快又取得《宣和博古圖》並復興了徽宗的新成禮器。古銅器的風格不僅影響到宋金南北各地瓷窯，連遠在朝鮮半島的高麗青瓷也可見三代銅器的因素。這些在漢地基本上前後相承的幾個禮器系統，在李朝世宗的祭器圖說中同時并陳，原來彼此競爭、你消我長的局面模糊了，呈現出的是一個不同時代的綜合體，像個時間膠囊一般。有些在漢地已經不復存在的禮器造型仍然透過新解釋而被保留下來，甚至流傳到今日。

儒學在東亞世界的流播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如何在不同的脈絡中與各地文化進行互動、轉化、衝突與融合是目前學界關懷的中心。[131] 學者們對於儒家經典的研究有助於我們瞭解上層知識份子思想、價值觀念之形成與發展，本文則透過與禮相關的有形之「物」看到文化互動的物質面，直視當中「自我」與「他者」間的各種關係，其間的拉鋸、接受、與轉化。徽宗一朝將新成禮樂制度與器用輸出至高麗，有其政治目的與象徵性，高麗一方的接受亦然；動作雖大，但對原已擁有一套制度的高麗而言，不一定可以在短時間內真正接受、內化。十二世紀早期宋徽宗的賜禮賜樂與稍晚高麗仿古銅青瓷的出現是否有直接關係，仍然不太清楚。高麗仿古銅青瓷的出現也可能發生在南宋時期杭州與高麗的交流，根據目前看到的資料推測，這個可能性很高。我們知道，《宣和博古圖》一書雖完成於徽宗末年，但在當時混亂的政局中，不一定鏤板印行；目前確知的鏤板時間是在南宋紹興年間、朝廷從北方重新尋得此書之後，而印刷地點在杭州。[132] 高麗青瓷中有全仿《宣和博古圖》者，時間應在該書鏤板之後，

---

[131] 關於東亞儒學與政治近來有大量研究，關於此研究之視野、方法與目標，參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132] 相關討論見許雅惠，〈《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的版印特點與流傳〉，《古今論衡》，第18期（2008），頁76-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忠實仿古的風格也與南宋杭州一帶的作法遙相呼應，因此推測這類青瓷的出現可能與開城、杭州之間的交流有關。至於南宋仿古銅器物在杭州地區的出現有其脈絡，一方面是風雅的象徵，一方面也包含了對舊都汴京文化的緬懷；而這類青瓷對高麗上層階級的意義、在高麗出現與使用的脈絡等問題，是未來研究應當注意的問題。

朝鮮時期的資料，無論是圖籍、或是文物，均較高麗時期豐富許多。由於文章所討論的「復古」器物（當中大多為祭器）在朝鮮時期主要仰賴圖籍以為製作樣本，因此在十五世紀李朝禮儀成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世宗實錄》之「祭器圖說」成為討論重點。根據與中國圖籍的比對，我們可以還原這些圖籍原來在中國的脈絡，追蹤它們傳入東國的過程，並分析在朝鮮世宗朝如何被擷取、使用。從這些圖籍的分析也呈現出文化交流當中一個重要的面向，亦即在文化邊緣的所謂「接受者」對於核心地「新知」的追求，已傳入的古老知識有時似乎要受到「新知」的再認可以獲得新生，如：「祭器圖說」之取《事林廣記》對《三禮圖》的再解釋。這讓我們再思考傳統「禮失求諸野」的說法—雖然在文化邊緣地可看到與文化中心地類似之禮與禮器，但內涵可能經過多重的轉化。

從高麗到朝鮮，中間明顯有一個缺環，也就是麗末蒙元時期。十三世紀上半蒙古多次入侵高麗，迫使高麗成為元朝藩屬；十三世紀下半元、麗除了宗藩關係外，也締結姻親，兩地人員流動的結果也促進了高麗與元朝的文化交流，朱子學之傳入高麗即是一例。此時正當朱子釋奠儀在元朝各地逐漸普遍施行之際，推測釋奠儀與釋奠祭器應該也傳入高麗，不過尚無實物證據。在韓國新安外海發現的沈船可說是此一時期兩地交流的見證，新安船中出水不少元代仿古銅器，這讓我們思考以下一系列的問題：有哪些宋元仿古類型器物、文物傳入高麗（甚至曾有任何商周銅器傳入高麗否）？在高麗是如何使用，作為實用器還是收藏品？宋元士大夫的古銅鑒藏風氣對高麗是否有任何影響？本文對於作為媒介之「物」的實質作用只能初涉，但這無疑是日後研究應特別關注之處。

作為一個初步的研究，本文嘗試討論在文化互動中，看似被動的文化受納方如何主動地將外來文化轉為己所用，呈現出這動態互動（interactive）的過程，在這挪用（appropriation）的過程中，一個文化體的性格與特殊性得以顯現。另外，在文化交流的研究中，如何避免去脈絡化，是個挑戰。筆者雖意識

到此問題，但限於時間與能力，尚無法深入討論高麗、朝鮮的情境脈絡。文章中解決的問題有限，但筆者衷心希望文章中觀察到的現象與提出的問題是有意義的，可以提供有興趣的研究者一個日後思考的出發點。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1113－1114年徽宗禮制改革重要舉措

時間	舉措	資料來源*
政和三年（1113）	正月甲寅行鄉飲酒禮。	《政和五禮新儀》文淵閣四庫，冊647，頁34
	庚辰詔議禮局新修五禮儀注，宜以政和五禮新儀為名。	《紀事本末》卷133，頁4190
	四月庚戌，頒五禮新儀。	《宋史》卷21，頁391 《紀事本末》卷133，頁4190-4191
	五月己酉手詔，崇寧之初納魏漢津之說成大晟新樂，薦之郊廟而未施于燕享，夫今樂猶古樂也，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按試于庭……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仍令尚書省措置立法。	《紀事本末》卷135，頁4237《宋大詔令集》卷149，頁551
	七月己亥詔……比裒集三代鼎彝簠簋盤匜爵豆之類，凡五百餘器，載之於圖，考其制而尚其象，與今薦天地饗宗廟之器，無一有合，去古既遠，失其傳矣。……可於編類御筆所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具畫來上，朕將親覽，參酌其宜蔽，自朕志斷之，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幾先王垂法後世。	《紀事本末》卷134，頁4193-4194
	七月己亥，成立禮制局，督造禮器（一說政和二年）。	《紀事本末》卷133，頁4192 《長編》卷91
	十月乙丑，閱新樂器於崇政殿，出古器以示百官。 十月乙丑，御崇政殿閱舉制造禮器所之禮器，并出古器宣示百官。	《宋史》卷21，頁392 《紀事本末》卷134，頁42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和三年（月份不詳）	徽宗皇帝祀圜丘方澤太廟明堂禮器窾識三卷政和癸巳，帝獲周罍于鎬京，秋獲商卣，獲兕敦于長安，又獲黃目尊于浚都，後復幽燕，獲耶律德光所盜上古寶玉尊，形製與黃目尊等瑩然無少玷缺，在廷莫知所用，帝獨識其為灌尊，實周人之重寶。詔禮官圜丘祭天之器，仿古盡用吉玉，然後之古人之祀，不特止于玉几玉爵玉豆也。	《籀史》上，頁1-3
	獲楚公鐘于鄂州嘉魚縣。 又見《鐘鼎款識》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進楚公鐘。	《金石錄》卷11，頁287 《鐘鼎款識》，頁67
	秘閣有敦，其實鼎也。政和三年內降宣和殿古器圖，凡百卷，考論形制甚備，於是館下以藏古器，別為書譜上。	《廣川書跋》，頁683
政和四年（1114）	三月甲子獲寶簋：「明年獲周錞，越三月甲子獲寶簋。帝承天休，憲三代稽古，象物昭德于彝器……命我先人，典司制作，肇新宋器……於是一洗漢唐諸儒臆說之陋，萬世而下始識三代尊彝之制，使六經所載，不為空言，共惟徽宗皇帝聖明述作之盛，一時文物比隆三代，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籀史》卷上，頁4
	天賜簋：帝受元命，天易帝簋，用綏于神祇……。	《政和禮器》，頁55
	四月癸丑，閱太學、辟雍諸生雅樂。	《宋史》卷21，頁393
	五月庚午十又二日丙戌夏至日，「徽宗皇帝政和四年夏祭方澤禮器窾識一卷」刻長銘器類包括：牛鼎、簠、簋。另有犧象鼎彝尊罍壺豆二十八，款器則惟旅。	《籀史》卷上，頁4
	五月夏祭皇地祈一事。	《長編拾補》卷33，頁4-7
	八月丙寅，鑄明堂太室牛鼎、清廟禮簋。	《政和禮器》頁48、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資料來源書目簡稱：

《長編》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紀事本末》　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長編拾補》　黃以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政和禮器》　孫詒讓，《宋政和禮器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不著撰人
《宗廟儀軌》，서울：서울大學校奎章閣，1997。
不著撰人
《社稷署儀軌》，서울：서울大學校奎章閣，1997。
不著撰人
《纂圖互註周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不著撰人
《纂圖互注毛詩》，臺北：故宮博物院，1995。
太平老人
《袖中錦》，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5，子101。
王厚之
《鐘鼎款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安珦
《晦軒先生實紀》，韓國歷代文集叢書，서울：景仁文化社，1999，冊35。
朱熹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宋綬、宋敏求
《宋大詔令集》，臺北：鼎文，1972。
宋徽宗敕編
《宣和博古圖》，至大重修本。
李燾
《續資治通鑑長編》，臺北：世界書局，1961。
阮逸、胡瑗
《皇祐新樂圖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冊211。
周煇著，劉永翔校注
《清波雜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
孫詒讓
《古籀拾遺附宋政和禮器文字考》，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243。
徐一夔
《明集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冊649。
徐松輯
《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興禮書》，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822-823。
徐兢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張彥遠
《歷代名畫記》，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1985，冊53。
脫脫
《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陳元靚
《事林廣記》，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冊1218。
陳祥道
《禮書》，嘉慶九年郭氏校經堂刊本。
《禮書》，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3，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編
《朝鮮王朝實錄》，서울：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
黃以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臺北：世界書局，1961。
楊仲良
《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北京：北京圖書館，2003。
董逌
《廣川書跋》，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1986，第三輯38冊。
翟耆年
《籀史》，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趙希鵠
《洞天清祿集》，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1985，冊50。
趙明誠
《宋本金石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
歐陽修
《歐陽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鄭居中
《政和五禮新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冊647。
鄭麟趾
《高麗史》，漢城：延世大學校出版部，1961。
聶崇義
《新定三禮圖》，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一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人論著

久保智康
2010 〈中世日本における倣古銅器の受用と模倣〉,《東アジアをめぐる金属工芸—中世・国際交流の新視点》，アジア遊学134，東京：勉誠出版，頁173-191。
2010 〈「東アジアをめぐる金属工芸」その成果と課題—中国、朝鮮、日本、そして琉球〉,《東アジアをめぐる金属工芸—中世・国際交流の新視点》,アジア遊学134，東京：勉誠出版，頁256-280。
2011 〈茶の湯における唐物銅器〉,《野村美術館研究紀要》,第20期，頁1-66。
久保智康著，彭濤譯
2008 〈新安沈船裝載的金屬工藝品：其特點以及新安沈船返航的性質〉,《南方文物》,4期，頁142-154、141。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
1992 《高麗青磁への誘い》,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1996 《粉青沙器》,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2008 《天にささげる器：朝鮮時代の祭器》,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1996 《南宋官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1997 《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今井敦
1993 〈海を渡つた高麗青瓷〉,《Museum 東京國立博物館美術誌》,第503期（2月）,頁25-33。
尹龍二著，片山まび譯
1998 《韓國陶瓷史の研究》,東京：淡交社。
尹龍二撰，李炳瓚譯
1992-94 〈高麗青磁の起源〉,《東洋陶磁》,第22期，頁33-40。
文化公報部編
1983 《新安海底遺物》,東京：同和出版社。
片山まび
2002 〈再生産される威信財—朝鮮王朝初期の祭器とその生産〉,《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94（3月）,頁3-14。
2007 〈從亞洲觀點看高麗青瓷—以研究史所見的對外關係為中心〉,《故宮文物月刊》,第24卷第11期（2月），頁38-45。
王牧著，久保智康、廖佐惠譯
2010 〈中国南方地域における宋・元期の倣古青銅器〉,《東アジアをめぐる金属工芸—中世・国際交流の新視点》,アジア遊学134，東京：勉誠出版，頁126-1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任金城
1990 〈木刻六經圖初考〉,《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 北京：文物出版社。
伊藤郁太郎
1992-94 〈高麗青磁をめぐる諸問題—編年論を中心に〉,《東洋陶磁》, 第22期，頁5-17。
2002 〈朝鮮時代の官窯の成立と展開〉,《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 東京：東洋陶磁學會，頁263-269。
吉良文男
2008 〈韓国陶磁つれづれ私記（11）全羅南道と高麗青磁（上、中、下）〉,《陶說》, 通号661（4月）, 頁66-69；通号662（5月）, 頁82-86；通号663（6月）, 頁51-55。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2007 《景德鎮湖田窯址》, 北京：文物出版社。
西谷正
1992-94 〈日本出土の朝鮮陶磁—高麗青瓷を中心として〉,《東洋陶磁》, 第22期，頁65-72。
佐川美術館編
2006 《韓国ソウル湖林博物館所藏李朝陶磁の名品—白磁と粉青沙器》, 滋賀：佐川美術館。
李玉珉編
2003 《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李定恩
2011 〈三代意象的嬗變：《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 論文發表於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10月，未刊稿。
沈暘
2008 〈李氏朝鮮時期都城文廟祭孔考〉,《故宮博物院院刊》, 第3期，頁79-98。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
2008 《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 北京：文物出版社。
金立言
2000 〈高麗青瓷研究基礎問題〉,《故宮文物月刊》, 第18卷第5期，頁58-73。
金英美
2002 〈越窯製瓷技術向高麗青瓷的傳播與影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 第5輯，頁201-225。
南秀雄
1992-94 〈円山里窯跡と開城周邊の青磁資料〉,《東洋陶磁》, 第22期，頁105-120。
胡德智、萬一編
1999 《燦爛與淡雅—朝鮮、日本、泰國、越南陶瓷圖史》,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
唐俊杰
2006 〈祭器、禮器、邵局：關於南宋官窯的幾個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 6期，頁45-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2 《寺龍口越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
浙江省博物館
2000 《浙江紀年瓷》，北京：文物出版社。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
1998 《宋代耀州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
馬爭鳴
2008 〈杭州出土的高麗青瓷〉，《東方博物》，第29輯（4期），頁109-115。
2009 〈中國出土的高麗青瓷〉，《東方博物》，第33輯（4期），頁59-65。
國立故宮博物院
2000 《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崔健撰，吉良文男譯
1992-94 〈韓國初期青磁の分類と變遷—窯址出土品を中心に〉，《東洋陶磁》，第22期，頁41-64。
張柏編
2008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梨花女子大學校博物館編
1990 《梨花女子大學校創立100周年記念館博物館新築開館圖錄》，서울：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
許雅惠
2003 〈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4期，頁1-26。
2008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的版印特點與流傳〉，《古今論衡》，第18期，頁76-96。
2011 〈南宋金石收藏與中興情結〉，《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1期，頁1-60。
陳尚勝
1997 《中韓交流三千年》，北京：中華書局。
陳芳妹
2001 〈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0期，頁37-160。
2011 〈「與三代同風」：朱熹對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1期，頁61-150。
楊昭全著
2004 《中國—朝鮮．韓國文化交流史》，北京：昆侖出版社。
趙士煒輯
1987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五卷續目一卷，中國歷代書目叢刊，北京：現代出版社。
劉廉銀
1984 〈慈利縣出土的元代銅簠〉，《文物》，5期，頁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鄭良謨、秦華秀
1992 《高麗陶瓷銘文》，서울：國立中央博物館。
鄭良謨著，金美英譯，金光烈校
2000 《高麗青瓷》，北京：文物出版社。
鄭良謨撰，李炳瓚譯
1992-94 〈干支銘を通して見た高麗後期象嵌青磁の編年〉，《東洋陶磁》，第22期，頁19-31。
謝明良
2002 〈對於史天澤墓的一點意見—兼評〈石家莊後太保村史氏家族墓發掘報告〉〉，《故宮文物月刊》，第20卷第1期，頁76-103。
2010 〈北宋官窯研究現狀的省思〉，《故宮學術季刊》，第27卷第4期，頁1-44。
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編
1991 《韓國學基礎資料選集—中世篇》，城南市：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
국립고궁박물관（國立古宮博物館）
2005 《국립고궁박물관개관도록（國立古宮博物館開館圖錄）》，서울：국립고궁박물관。
국립중앙박물관（國立中央博物館）
2008 《마음을담은그릇：신안香爐》，서울：국립중앙박물관。
명지대학교박물관（明知大學校博物館）
2010 《백자제기、禮와藝가만나다（白瓷祭器：禮與藝的交會）》，용인시：명지대학교박물관。
장남원（張南原）
2006 《고려중기 청자 연구（高麗中期青瓷研究）》，서울：혜안。
최순권（崔順權）
2004 〈종묘제기고（宗廟祭器考）〉，收入궁중유물전시관（宮中遺物展示館），《（宗廟大祭文物）》，서울：궁중유물전시관，頁156-178。
호림박물관（湖林博物館）
2010 《분청사기제 粉青沙器祭器》，선울：호림박물관。
Barnard, Noel
1973 “Records of Discoveries of Bronze Vessels in Literary Sources and Some Pertinent Remarks on Aspect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6, no. 3 (December), pp. 455-546.
Bickford, Maggie
2006 “Huizong’s Paintings: Art and the Art of Emperorship,” in Patricia B.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p. 453-513.
Gompertz, G. St. G. M.
1953 “The "Kingfisher Celadon" of Koryo,” *Artibus Asiae 16*, no. 1/2, pp. 5-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su, Ya-hwei
2010 “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in the Era of Print, 960-1279,”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Louis, François
2008 “Cauldrons and Mirrors of Yore: Tang Perceptions of Archaic Bronzes,” *Georges-Bloch- Jahrbuch der Universität Zürich*, no. 13, pp. 203-235.
Mino, Yutaka
1986 “A Re-Examination of an Inlaid Celadon Mae-byong Decorated with Cranes and Clouds,” *Archive of Asian Art*, no. 39, pp. 71-74.
Moser, Jeffery C.
2010 “Recasting Antiquity: Ancient Bronzes and Ritual Hermeneutics in the Song Dynasty,”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Park, Chong-hua, eds.
1973 *Survey of Korean Arts: Traditional Music*, Seoul: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Poor, Robert
1965 “Notes on the Sung Dynasty Archaeological Catalogs,”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no. 19, pp. 33-44.
Pratt, Keith L.
1976 “Music as a Factor in Sung-Koryŏ Diplomatic Relations 1069-1126,”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62.4/5, pp. 199-218.
1981 “Sung Hui Tsung’s Musical Diplomacy and the Korean Respon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44, no. 3, pp. 509-521.
Provine, Robert C.
1988 *Essays on Sino-Korean Musicology: Early Sources for Korean Ritual Music*, Seoul: IL JI SA.
Sena, Yun-Chiahn C.
2007 “Pursuing Antiquity: Chinese Antiquarianism from the T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Song, Bang-song
2000 *Korean Music: Historical and Other Aspects*, Seoul: Jimoondang Publishing Compan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政和鼎，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高23公分，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頁100。

圖2　青白瓷鼎式爐，江西省樟樹市南宋端平三年（1236）墓出土，高6.8公分。張柏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第14冊，圖63。

圖3　龍泉窯鬲式爐，浙江德清縣咸淳四年（1268）吳奧墓出土，高6.5公分。浙江省博物館，《浙江紀年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圖版216。

圖4　方鼎形香爐，十二世紀，高18.4公分，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鄭良謨、秦華秀，《高麗陶瓷銘文》（서울：國立中央博物館，1992），頁20，圖9。

圖5　子韋方鼎，商晚期，河南安陽孝民屯南M2508，高25.3公分。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冊2，圖版43。

圖6　「商召夫鼎」，宋徽宗敕編，《宣和博古圖》，至大重修本，卷一，頁17。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7　圓鼎形香爐，十二世紀，高17公分，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青磁への誘い》（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1992），頁46，圖34。

圖8　銅鼎，1323年左右，通高15.9公分，新安海底沈船。국립중앙박물관（國立中央博物館），《음을담은그릇：신안香爐》（서울：국립중앙박물관，2008），頁15。

圖9　鼎形香爐，十二世紀，高16.2公分，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胡德智、萬一編，《燦爛與淡雅—朝鮮、日本、泰國、越南陶瓷圖史》（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1999），頁14。

圖10　鼎形香爐，十二世紀，高12公分，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校博物館藏。梨花女子大學校博物館編，《梨花女子大學校創立100周年記念館博物館新築開館圖錄》（서울：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1990），圖版76。

圖11　全羅南道康津郡沙堂里窯址採集陶片。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青磁への誘い》，頁183，圖174-6。

圖12　全羅南道康津郡沙堂里窯址採集陶片。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青磁への誘い》，頁183，圖174-5。

圖13　青瓷方爐，十二世紀，高11.9公分，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青磁への誘い》，頁46，圖35。

圖14　獸面紋陶片，杭州私人收藏。唐俊杰，〈祭器、禮器、邵局：關於南宋官窯的幾個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6期，頁52，圖4。

圖15　越窯鼎式爐，十二至十三世紀，浙江寺龍口越窯址出土，高9.1公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寺龍口越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227，圖309。

圖16　「淳化四年」太廟祭器，高35公分，梨花女子大學校博物館藏。梨花女子大學校博物館編，《梨花女子大學校創立100周年記念館博物館新築開館圖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서울：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1990），頁63，圖66。

圖17　「淳化三年」太廟祭器，可能為豆殘件，円山里窯址出土。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青磁への誘い》，頁180，插圖73。

圖18　李朝青銅鐘（左）與大晟鐘（右）比較。

（左）국립고궁박물관（國立古宮博物館），《국립고궁박물관개관도록（國立古宮博物館開館圖錄）》（서울：국립고궁박물관，2005），頁109。

（右）國立故宮博物院，《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頁102。

圖19　李朝黃銅雞彝（上）與《明集禮》雞彝（下）比較。

（上）국립고궁박물관（國立古宮博物館），《 립고궁박물관개관도록（國立古宮博物館開館圖錄）》，頁100，圖58。

（下）徐一夔編，《明集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649，頁195。

圖20　李朝黃銅龍尊，高29.2公分，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국립고궁박물관（國立古宮博物館），《국립고궁박물관개관도록（國立古宮博物館開館圖錄）》，頁94，圖53。

圖21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左）與《世宗實錄》（右）簋的比較。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30。《朝鮮王朝實錄》（서울：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頁180。

圖22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左）與《世宗實錄》（右）簋的比較。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31。《朝鮮王朝實錄》（서울：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頁180。

圖23　粉青沙器鑲嵌雷文簠，15世紀，高7.2公分，韓國湖林博物館。佐川美術館編，《韓国ソウル湖林博物館所藏李朝陶磁の名品—白磁と粉青沙器》（滋賀：佐川美術館，2006），頁83，圖63。

圖24　粉青沙器鑲嵌山紋祭器（著尊？），15世紀，高19.7公分，韓國湖林博物館。佐川美術館編，《韓国ソウル湖林博物館所藏李朝陶磁の名品—白磁と粉青沙器》（滋賀：佐川美術館，2006），頁90，圖70。

圖25　著尊，《世宗實錄》。《朝鮮王朝實錄》（서울：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頁184。

圖26　銅簠，「大德乙巳」（1305）款，長24、寬19.5公分，湖南慈利出土。劉廉銀，〈慈利縣出土的元代銅簠〉，《文物》，1984年5期，頁81。

圖27　白瓷祭器，十七世紀以後，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天にささげる器：朝鮮時代の祭器》（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08），圖17。

圖28　《禮書》（上）與《世宗實錄》（下）雞彝比較。陳祥道，《禮書》，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3（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頁368。《朝鮮王朝實錄》（서울：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頁1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9 犧尊，《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指海本。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32。

圖30 （左）犧、象尊，《事林廣記》，元至順建安椿莊書院刻本；（右）犧尊，《世宗實錄》。陳元靚，《事林廣記》，續修四庫全書，冊12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頁377。《朝鮮王朝實錄》（서울：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冊五，頁184。

圖31 犧、象尊，《三禮圖》，南宋淳熙鎮江府學刻本。聶崇義，《新定三禮圖》，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191。

圖32 粉青線刻象紋尊，全羅南道光州市忠孝洞窯址出土。片山まび，〈再生産される威信財—朝鮮王朝初期の祭器とその生産〉，頁6，圖3。

圖33 白瓷鐵繪象尊，17世紀，高17.6、長33.5公分，韓國湖林博物館藏。佐川美術館編，《韓国ソウル湖林博物館所藏李朝陶磁の名品—白磁と粉青沙器》（滋賀：佐川美術館，2006），頁58。

圖34 《皇祐新樂圖記》（左）與《世宗實錄》（右）牛鼎。阮逸、胡瑗，《皇祐新樂圖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冊211，頁18。《朝鮮王朝實錄》（서울：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頁186。

圖35 《皇祐新樂圖記》鐘圖（左）李朝特鐘（右）。阮逸、胡瑗，《皇祐新樂圖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冊211，頁12。국립고궁박물관（國立古宮博物館），《국립고궁박물관개관도록（國立古宮博物館開館圖錄）》（서울：국립고궁박물관，2005），頁112，圖66。

圖36 《纂圖互註周禮》（左）與《世宗實錄》（右）山罍。《纂圖互註周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9。《朝鮮王朝實錄》（서울：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頁185。

圖37 「禮局樣」，《纂圖互註周禮》。《纂圖互註周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9

圖38 《周禮圖》，江西上饒信州府學本拓片，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39 山尊，《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指海本。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35。

圖40 山罍，《明集禮》。徐一夔，《明集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冊649，頁106。

圖41 青花白瓷鐵繪三山紋罍，15世紀後半，高27.8公分，韓國湖巖美術館藏。胡德智、萬一編，《燦爛與淡雅—朝鮮、日本、泰國、越南陶瓷圖史》（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1999），頁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